

上海“孤岛”中的难民救助与 中共的地下动员(1937—1940)

徐桂裕

(南京大学, 江苏南京 210033)

摘要: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大量上海市区及郊区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他们赶赴中立的租界寻求庇护,为了安置难胞,租界内各慈善机构纷纷组织建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救济。与此同时,刚刚完成组织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意识到难民工作可以作为抗日救亡与发展党组织活动的突破口。因此,省委专门组建难民工作委员会,意图通过渗透慈善组织、构建教育网络等策略,将人道主义的难民救助转化为群众政治动员的实践。难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们以教师、医生等合法身份为掩护,在难民群体中开展阶级启蒙与抗日宣传,并秘密向新四军输送千余名兵员,实现了生存救济与革命力量积蓄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 上海; 中共江苏省委; 难民工作委员会; 难民救助; 群众动员

中图分类号: K 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93(2026)01-0023-06

DOI:10.15954/j.cnki.cn32-1529/g4.2026.01.006

Refugee Relief in Shanghai's "Isolated Island" and the CPC's Underground Mobilization(1937—1940)

XU Guiyu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3,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Battle of Shanghai in August 1937 displac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urban and suburban Shanghai and reduced them to refugees, who fled to the neutral concessions to seek asylum. To resettle these refugees, var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concessions organized and established shelters to provide relief. Meanwhile, the recently reorganized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cognized that refugee relief could serve as a strategic entry point for both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efforts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own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Accordingly, the Provincial Committee set up a dedicated Refugee Work Committee, aiming to transform humanitarian relief into a form of mas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by infiltrat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building educational network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is committee, underground CPC members operated under legitimate covers such as teachers and doctors, carrying out class-consciousness enlightenment and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among the refugees, and secretly dispatched over 1,000 recruits to the New Fourth Army, achieving the dual goals of providing immediate survival aid and accumulating revolutionary strength.

Key words: Shanghai;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Refugee Work Committee; refugee assistance;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收稿日期: 2025-05-12

作者简介: 徐桂裕(1994—),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KYCX24_00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28)。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导致大量上海市民和郊县群众家破业毁,沦为难民。为了安全和生存,大多数难民选择逃到租界避难。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时,累计有七十多万难民逃入了英、美、法租界及周边区域,致使租界人口暴增至三百万左右。此时,英、美、法等国控制的租界,被日军四面包围,从苏州河以南到肇嘉浜以北、黄浦江以西至法华路、大西路(今新华路、延安西路)以东小块区域,当时将其喻为“孤岛”,因而也将上海自沦陷之日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为止的这一段时期称为“孤岛时期”。孤岛时期,尽管日伪与西方国家就租界管辖问题发生许多摩擦,但特殊的地理空间一方面维持了租界的中立属性,保障了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共江苏省委的重建,及其领导上海地下党在难民中的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研究者对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难民问题给予了积极关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研究进展。分析其思路,既往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从宏观视角,介绍上海各界在救济难民、稳定社会秩序等工作上,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慈善活动;^[1]二是从微观视角,聚焦中共以及上海其他社会组织在救济难民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具体举措。^[2]本文深入探讨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在租界难民群体中的救济与宣传动员工作,藉以深化对中共在沦陷区城市工作的理解,以期推动对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城市抗战的研究。

1 战火中上海“孤岛”里的难民潮危机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在敌人的侵略炮火下,大量职工、工人及其家属沦为流落街头的难民,他们从闸北、虹口、江湾、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涌向租界避难。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郊区,更多的民众家破业毁,沦为难民。据调查,到十月初,上海附近的难民总计达一百三十万人。^[3]当注意到租界不会遭受日军攻击后,不少难民都认为此地安全,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租界人满之患。为了维持秩序,租界当局紧闭各个进口处的铁门,只开放较狭窄的通道,并缩减每日开放时间,因此,难民们蜂拥在铁门外,争相夺路,老弱者甚至惨遭踩死。1937年11月10日一天

中,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南端法租界铁门附近,就有男子和幼童各两人被践踏致死。随着战区的扩大,涌向租界的难民不断增多,难民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店职员、农民及其家属。无亲可投的难民们进入租界后,或游荡在街头,或就地坐卧露宿,马路边、弄堂口、屋檐下,到处都是难胞的身影。据战后统计,每日冻饿而死者超过一百人,儿童死亡数每日达二百名左右,上海慈善机构普善山庄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的1个月内,于租界周边收殓的难民尸体就有1.3万具^{[4][14]}。因此,如何安置战区难民成为当时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人道主义危机,上海各界爱国团体和一些国际救济组织不惧日军的军事恐吓,纷纷参与其中,红十字会、红卍字会、同乡会、教会等各种国际、国内慈善组织,经爱国人士的倡导推动,在租界及周边区域成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上海召集各慈善团体组织负责人屈映光、吴大琨等人,在仁济堂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即慈联会)。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负责人潘公展开始派遣人手主持该协会工作,试图控制上海的慈善界。然而,国民党控制慈联会后,在淞沪战争期间不负责任的表现令人失望。为了安置好已经送到仁济堂的难民,赵朴初和同为慈联会常委委员的吴大琨举了一面红十字旗,带着大批难民从云南路转到西藏路朝北走,先到宁波同乡会安置一批,再转入北京路在金城大剧院(今黄埔剧场)安置一批,由此,慈联会一夜之间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收容所^[5]。从1937年8月到1940年上海秩序恢复,慈联会前后设立了五十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6][15]}

随着难民的不断涌入,除了慈联会,还有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上海分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以及各地同乡会等团体,都在租界内办起了难民收容所,协力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在战区附近,慈善团体救护难民的卡车就达40辆。而因战事被迫关门停业、停学的戏院、旅店、银行、仓库、学校,全部被临时征为收容所。1937年底,设立在公共租界里的难民收容所有154处,并有临时难民医院7所,加上设立在法租界的收容所,累计数目达200多个。另外,不在租界范围内的南市方浜路、民国路(今人民

路)地区,因为聚集了大量被关在租界铁门外的难民,而被辟作难民区。租界周边区域的公共建筑、寺院庙堂、机关、学校全被用来临时收容难民。1937年11月,累计设立了104个收容点。至1937年底,租界和南市难民区的收容所总共有300多个,所内难民合计约50万人。^{[4]37}在难民吃穿用度等给养工作上,均由各慈善团体自行筹措资金,但不少团体经费来源有限,救济难民的开支浩繁,实在难以维持,于是各团体商请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担负开支。这一委员会以筹募款项、调节救济工作为工作使命,慨然承担了各收容点的开支,自1938年1月起,负担了155处收容所、十二万九千余难民定时的给养工作,而收容所内的其他工作仍由慈善团体负责。据红十字会统计,每月需募集60余万元以覆盖难民口粮、衣被、医药等开支,^[7]为此,上海各界人士慷慨解囊,银行业、未停工的店职员和工人们等纷纷响应号召,捐物捐资,维持了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

2 中共在难民收容所中的组织发展策略

大批的难民收容所,既是战时群众集中之处,也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场所。中共意识到难民不仅是救济对象,也是潜在的抗日力量,在对其进行救济、收容、给养等工作时,也应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发动他们参与到抗战阵线中来。因此,难民工作成为战争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群众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对上海难胞的呼声,中共迅速做出行动:中共中央在战争爆发前,为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就已派遣刘晓于1937年6月下旬抵达上海,负责组织筹建工作。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租界“孤岛”成立,领导上海市以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城市党的地下党组织工作,直属中共中央领导。^{[8]158}成立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立即重视上海难民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指示,^[9]决定集中力量到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将难民救济视为救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向上海地下党发出指示“在饥寒交迫中的几十万被难同胞,他们由于实际生活所增长起来的极度抗日情绪,我们要根据他们的不同阶层、不同要求,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且争取他们里面

的优秀分子到抗日团体和党里来,这是目前中心工作之一。”^①到难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展党组织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的一大工作方向。

鉴于租界及附近区域难民数有70万人,1937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难民运动委员会(简称难委),难委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单位,直到1939年12月上海秩序恢复,难民收容所逐渐关门后,难委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改为难民工作总支。至1940年夏,难民工作总支活动停止。两年时间里,难委作为新建立的党组织,党员人数从无到有,累计发展党员390名,难委书记先后由黄浩、陈茹、汤镛、周克四人担任。^{[8]163}

为了加强在难胞中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同时也为了保障组织安全,中共需要派遣地下党员潜伏进收容所开展工作,潜伏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派遣一批党员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安插到难民收容所当管理员或者当难童的教师。在这些进步人士中,对中共潜伏工作贡献最多的是慈联会的赵朴初,他以佛教居士的身份,在慈联会下属的各难民收容所中推荐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担任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极大便利了难委的工作。当时,赵朴初认为,难民工作不是单纯的救济工作,而是整个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挑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来参加,因此他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向慈联会推荐了周克、朱启奎、刘平若、丁瑜、陈良、梅达君、吴宝龄、王珍、孟一如、马翔如等中共地下党员到各收容所进行管理工作,被悉数接收,之后,慈联会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由朱启奎、刘平若两名党员介绍,经赵朴初保荐而来,^{[6]152-153}大大降低了难委的工作难度;第二,一部分党员则以难民身份混入难民中进行工作。这部分党员很多都是国共合作后,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的老党员,例如淞沪会战期间,法租界卢湾区监狱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基本是共产党员,送到了慈联会的难民收容所,在所内地下党员的协助下,就地开展群众工作。他们的工作方针是:大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谨慎发展党员,为即将到来的恶劣形势打基础。^[10]由此,上海地下党顺利地潜伏进各大难民收容所,而“到难民收容所去工作”

^① 资料来自上海市档案馆《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7年12月29日)》

一时间成为中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行动口号,这也为后续的宣传动员工作打好了基础。

3 中共在难民收容所中的宣传动员工作

难民是一个特殊性质的团体,淞沪会战爆发后,他们逃入租界“孤岛”避难,一身之外无长物,几十万人去哪里安置,靠什么生活,都是摆在上海人民面前的严峻问题,但同时,这也是中共发动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机会,上海地下党过去不能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在战火中可以光明正大地宣传出来。刚刚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虽然党员数极少,但中共抗战到底的口号,在租界内外均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除了少数汉奸外,连国民党一贯强硬的反共分子也能接受。因此,中共在难民中开展公开、半公开的宣传动员工作相较于其他革命时期,更为便利与安全。

然而,难民工作又是一项特殊性质的群众工作。与过去的工农群众工作不同,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是流动的,有明显的过渡性,经过一定的时间,难民就会逐渐地离开,到社会各方面去。因此,中共江苏省委认为难民工作必须强调工作的突击性,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地下党员潜伏在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必须采取许多短期突击的办法,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聚集积极分子,进而吸取群众中的精华到党组织中来。依照省委的工作指示,难民工作委员会向所属党组织制定了七项宣传动员任务^{[11]165},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是:

3.1 难民中的教育

地下党员在难民尚未离开的时间里,利用收容所人员密集的特性,对难民、难童集中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胞的爱国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当时住在难民所的群众,主要是农民、失业工人、职员,阶级成分较好,对抗日教育、阶级启蒙教育的接受度高。孤岛时期,上海各难民收容所均建立了管理机构,一般正副主任下面设立管理组、给养组、教育组,其中潜伏地下党员最多的是教育组。以慈联会下属慈愿、大慈、慈兴三个大收容所为例,管理人员达80人,中共会在这些干部中组织读书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周克、黄浩等难委领导在收容所中被尊称为“教授”,他们为难胞、难童们编写教材。难委领导周克编写

的国语教材《战时课本》第一课名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内容深受难民们的好评。收容所的孩子有读书识字班,稍大的孩子上正规文化课,中共在难童的课程中都设置了政治教育的内容。而成年人则读《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等,妇女班学文化,也读浅一点的《社会发展史》,每逢“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日,中共会组织难民小组座谈会,并同步举办报告会、讨论会。除了文化教育,中共还组织了很多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娱乐活动来教育难民,比如办说书场,讲《岳飞传》,组织歌剧、话剧演出等,有些收容所还以“小茶馆”形式,开展歌咏、说书、演戏等多种多样的文娱宣传活动,更有一些收容所在中共的带领下成立歌咏队、演剧队、宣传队,不仅在收容所里演出,还到街头弄堂等公共场所进行宣传,^{[6]154-155}推动租界“孤岛”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3.2 难民中的党建

党员们在难民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就向各级党组织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党的组织是必要的。”^①因此,大量发展党员,成为中共江苏省委和难民工作委员会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在两年的收容所工作中,难委领导地下党员在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集中的难民收容所,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提高了他们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在难民中培养、教育了积极分子,发展了共产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很多地下党员在收容所里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些女党员脱下皮鞋,换下旗袍,剪掉辫子,和大家打成一片,得到大家的信赖。青年共产党员张巩、丁瑜就是这样在慈联会的大慈收容所和难民相处,用结拜姐妹的形式,把积极分子团结起来,然后进行个别工作,启发她们的觉悟。中共在大慈收容所里先后发展了10多个共产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壮大了难民中中共的力量。难委从事难民工作的共产党员,从开始时“借”自其他单位的三四十人,发展到300多人,在20多个难民收容所中建立了党支部,并领导更多的积极

^① 资料来自上海市档案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

分子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4]39-40}

3.3 难民中的支前活动

难委积极动员难胞中的壮丁到皖南新四军,参加抗日斗争活动。动员难民中的积极分子去参加新四军一直是难委工作重心之一,两年时间里,难委先后支持了第三批青壮年积极分子前往皖南。当时,由于租界内形势复杂,向皖南输送青壮年难民存在很多困难:首先,中共在租界地区的活动虽然是秘密的,但由于输送人力规模较大,这就要求做到租界当局不干涉。其次,由于战争仍在继续,陆运交通不便,运送大量人口出沪必须走水路,且必定要通过吴淞口,这就要求不被日本人察觉。另外,向皖南输送人力还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这就要求不被国民党政府阻碍。此外,难民中的积极分子虽然都有抗日觉悟,但要动员他们去新四军参加前线作战,还需进行更为细致的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自觉。针对这些问题,难委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通过赵朴初等民主人士在租界上层奔走推动,呼吁“移民垦荒”,这受到了租界当局的欢迎。路过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也以垦荒的名义,公开合法地要求通过。二是在难民所中,中共的公开口号是“移民垦荒”,以争取慈联会等慈善机构的同情与放行。对移民垦荒的对象,中共也做了深入细致的个别教育动员工作。这些个别动员工作是由党支部布置党员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合适人选,分工包干进行的。一般而言,收容所中的教育动员包括:从抗日救国谈到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抗日,鼓励大家积极参加武装抗战,从抗战的实际形势谈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路线,谈到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和他们行动的坚决、正确和伟大。在开展教育动员工作中,地下党员们会避免理论式、概念式的谈话,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语言,重用实际见闻,启发对象的觉悟。同时,教授难民们如何应付租界当局、沿途日伪部队和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时的盘问、检查等。三是统筹规划行动步骤,确保人员抵达皖南。中共事先将接受动员去新四军的人员进行编组、编队,建立了沿途的组织指挥系统。设立多个集中点分批集结,为每人发放衣物、难民证,检查行李并规定相关纪律以应对盘问,同时搭配少量老弱妇孺以符合“移民垦荒”名义。第一批人员于1938年7月间出发,共七百余人,难民所中的积极分子大部集中

在这一批,内有党员四十余人。到了1938年底、1939年初,难委又动员了第二批共二三百人前往皖南。1939年,难委动员了第三批约三百人前往皖南。可见,难民收容所动员工作极大地支持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活动。^{[11]166-168}

考虑到难民的流动性,除了宣传教育、发展党员与动员参加新四军外,难委开展的另外四项工作是:积蓄一批力量,输送到租界和日占区的工厂,作为上海社会秩序恢复、工商业复产复工后,开展工运工作的基础;组织一批农民回近郊区,开展近郊区工作,为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近郊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打下基础;有计划地分批输送青壮年积极分子去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一带,发展地方团体、组织,为中共江苏省委所属郊县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做好准备;通过难民工作,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采取合法形式,为难民募捐,筹办难童教育,开展生产自救等最广泛的社会活动。

4 结语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中共在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救济工作,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城市隐蔽战线的一次成功实践。面对日军侵略、国民党限制与租界势力干涉的复杂环境,中共江苏省委及难民工作委员会领导上海地下党以明确的工作方向、灵活的工作策略,将人道主义救济转化为政治宣教动员的契机,不仅挽救了数十万难民的生命,更在“孤岛”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抗日救亡路径。回顾中共在难民收容所中的工作,他们通过渗透慈联会等民间救济组织,以难民、难童教师、医生等合法身份为掩护,在难民的生存挣扎中植入阶级启蒙与抗日救亡意识,例如文化教育中通过《社会发展史》的隐蔽传播,培养难民的阶级意识,悄然瓦解着传统政治权威。这种“救济—教育—动员”的线性工作,使难民群体从被动受助者逐步转化为革命的潜在支持者,中共也因此培育遴选出大批信念坚定的党员,扩充了党组织力量。而向新四军输送千余名青壮年的行动,更是将城市隐蔽战线与敌后武装斗争直接联通,彰显了中共整合社会资源的智慧。

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共城市工作的独特方法论:全面抗战的特殊时期,在情形复杂的租

界“孤岛”里,中共以非政治化的人道行动为外衣,通过经济互助、文化渗透和组织发展,逐步构建起群众对党的政治信任。这种策略既规避了与国民党、日伪、以及租界当局的正面冲突,又潜移默化地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因此,难民工作不仅是中共城市隐蔽战线的成功实践,更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为理解中共的群众动员逻辑与危机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 [1] 张晓菲. 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 [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 [2] 张鼎.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难童工作[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4): 5-7.
-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抗日风云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4] 上海总工会. 抗战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 [5] 慈善团体及各医院积极救护伤兵难民[N]. 申报, 1937-08-15(06).
- [6] 赵朴初. 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M]//抗日风云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7] 会讯: 红十字新闻: 沪市收容所难民现有十二万人[J]. 中国红十字月刊, 1938(34): 26-27.
- [8]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组织部资料(1922春—1987.10) [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3.
- [9] 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M]//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4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0] 陈修良. 刘晓领导白区工作的回忆[M]//肃霜天晓: 刘晓纪念文集.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 [11] 周克. 难民工作和地下军工作回忆片段[M]//抗日风云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李梦雅)

(上接第16页)

5 结语

惠子“善譬”,其所作之譬喻建立在其名理学思想之上,在不同场景中所作的譬喻有着不同的目的,但均能折射出惠子的名理学思想。由于其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其譬喻所表达出的理念亦有相悖者,而这些相悖之论,又能体现出惠子在混乱的战国时期为实现名理学突破而进行的诸多尝试。惠子个案所展现的思想张力,也为学者理解战国名家学者在名实分离的剧变中,调和抽象名理与现实正名、吸收他家学说与坚持学派立场时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与复杂心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总之,惠子“善譬”这一命题,值得结合先秦名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刘向. 说苑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 李凯. 惠施的“万物毕同”思想浅记: 以“历物十事”为考察中心[J]. 天中学刊, 2017(5): 28-25.
- [3] 高杰. 惠子谈比喻[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1991(1): 26-27.
- [4] 牟宗三. 名家与惠子[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3.
- [5] 钱穆. 惠施公孙龙[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 [6]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 王恺銮. 尹文子校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8]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9]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0]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1]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12]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3]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责任编辑: 洲 颖)